

● NIUJUN ZHU ●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 牛 军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

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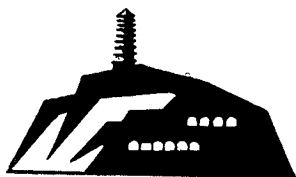
CONG YANAN ZOUXIANG SHIJIE

D231
28

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CONG YANAN ZOUXIANG SHIJIE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一九九二年·福州

闽新登字 01 号

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牛 军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625 印张 8 插页 229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11-01844-5
D·119 定价:软精装 5.80 元
精 装 8.20 元



①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936年～1947年）。



② 1936年冬，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保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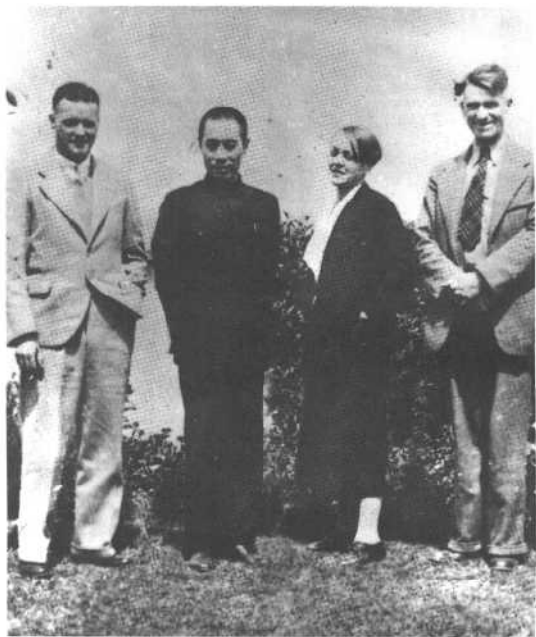


③ 抗战初期,苏联运送援华物资的卡车正驶往前线。



④ 1939年春，陈毅、粟裕在皖南云岭与外国友人合影（左起：德国记者锡伯、陈毅、加拿大护士尤恩、粟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⑤ 1938年，周恩来在武昌与外国朋友合影（左起：艾黎、周恩来、史沫特莱、艾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⑥1944年，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在延安合影。



⑦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在延安机场合影。



⑧ 1945年8月，苏联红军与八路军在张北地区会师。



⑨ 1945年8月30日，苏联红军某部与八路军某部在山海关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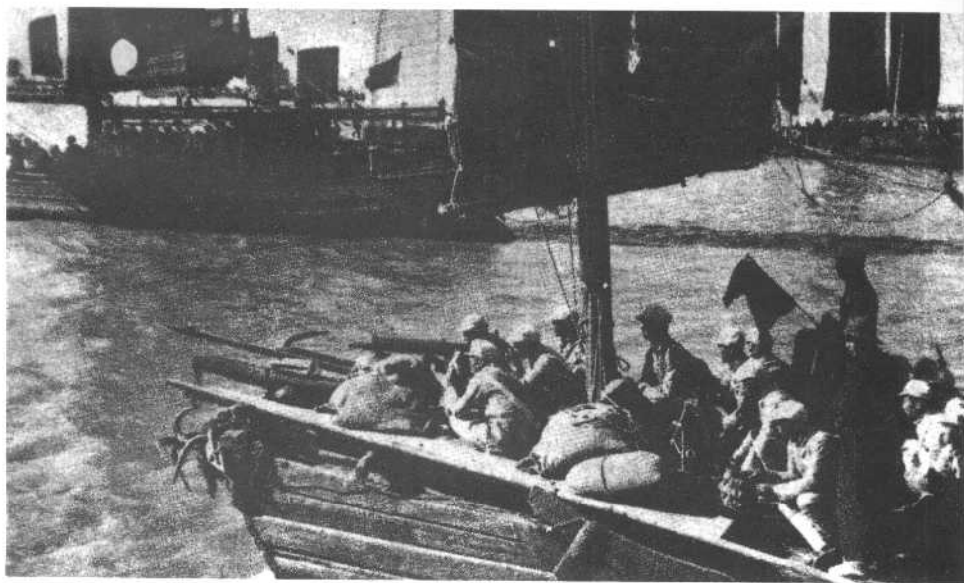
⑩毛泽东与美军代表和记者在延安（左起：克利福德·杨少校、毛泽东、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伊文·耶顿少校、记者罗德里克）。



⑪1946年1月初，周恩来与马歇尔在重庆马歇尔寓所前合影。



⑫1946年3月5日，毛泽东与马歇尔在延安机场检阅八路军部队。



⑬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横渡长江。



⑭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敞开大门	(11)
第二章 两个统一战线	(29)
第三章 “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	(50)
第四章 “利用矛盾”	(72)
第五章 重建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95)
第六章 退一步进两步.....	(116)
第七章 第一次尝试.....	(137)
第八章 “我们也讲现实主义”.....	(160)
第九章 “无法无天”.....	(178)
第十章 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	(199)
第十一章 向大国体系宣战.....	(220)
第十二章 彻底革命与统一战争.....	(244)
第十三章 历史性的抉择.....	(267)
结束语	
主要参考资料	(294)
后记	(299)

DI44/19

序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外交就这样在充满失败与屈辱中揭开了序幕。

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人面对的的确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仍在作着“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统驭万国”的旧梦，他们死抱着“中国中心”的陈腐观念，相信只要维持住中国的传统秩序和被他们视之为立国基础的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朝德威”必将“远被”，“万国”也终将会“来王”。西方入侵者的大炮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清王朝的幻梦。为了对付东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入侵，清王朝统治者用尽了中国旧武库中的一切可以被称之为传统法宝的手段。从弓箭长矛的武装抵抗，到“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外交，乃至“用夏变夷”的自我安慰。这一切都没有能改变由先进必然战胜落后的法则所决定的历史进程——中国逐步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万国”不仅没有“来王”，倒是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变成了列强谋求和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的工具。

清王朝面对的不仅是列强武力征服的冲击,还有这种冲击引起的中国社会的振荡。由于中国的大门被迫向世界打开,列强的坚船利炮赖以支撑的先进技术,以及这些先进技术得以日新月异的科学文化和典章制度,伴随着廉价商品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本来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当那些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时,他们不再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的神话了,也不再认为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可以供后来者无止境地自我陶醉,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也不可能再使中国永保太平和安全。他们相信的是应该向西方学习救国的真理,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独立,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受尊敬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危机,下层社会的起义和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在内外交困中摇摇欲坠。

列强的武力征服与中国的社会危机同时发生,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一直面临着“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这种选择,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和《辛丑条约》签订时,终于由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作出了结论,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从此堕落成卖国的政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时期中国的外交本质上是由国内政治的需要——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所决定的。的确,清王朝在行将灭亡之时,给中国外交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即统治者们总是将处理对外关系与阻碍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外交成了他们在旧秩序与新世界之间设置藩篱的手段。清王朝外交的这一特点,几乎被后来的历届反动统治者所继承。以此为开端,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已经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

当中国步入 20 世纪时,它在对外关系方面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中国人面对着一个不堪忍受的外部世界,同时也形成了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是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

制不断被强化和扩大，华夏大地在外来侵略者的践踏下变得满目疮痍。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与压迫下，中国人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与侮辱。列强用大炮逼迫中国开放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星条舰花旗轮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中国领土上被圈出一块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租界；在华外国人享受着甚至可以草菅中国人命的领事裁判权；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在京城及其门户地区耀武扬威。这一切一切对于几千年来一直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的确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从长期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一下子被抛到任人欺凌和宰割的地位，强烈的反差在中国人的内心引起剧烈的震动。自豪感与自卑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与抵制西方影响的强烈意识等等，矛盾地共存于中国人的心中，使中国人对世界事务、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等问题的看法长期摇摇摆摆，莫衷一是。

使人倍感屈辱的外部世界与中国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并经常产生恶性循环，这从深层次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必定是病态的和混乱的对外政策，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也必定是混乱和病态的。

正当中国外交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反帝洪流。辛亥革命是这股洪流掀起的第一个巨浪，它一举摧毁了“洋人的朝廷”——清王朝的统治。武昌起义的胜利曾经一度使人们相信，共和革命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随着革命的成功与新生的共和国的强盛，中国人在清王朝统治时期蒙受的耻辱，必定会被一扫而尽。然而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尽管革命者们为了争取外交承认和挽救危局，向帝国主义列强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却没有从它们那里得到丝毫的同情与支持。列强不允许中国出现任何带有民族革命色彩的政权，即使是温良恭俭让的革命也一样不允许。它们希望中国建立的是一个软弱、保守

的政府，如果不是这样的政府，就宁愿中国分裂；更何况它们还在打算利用中国的政治危机趁火打劫，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结果南京政府在内外压迫下夭折，孙中山本人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也辞去了大总统的职位。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很快便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一时期，列强分别与中国不断变更的中央统治集团、各派以及各地方军阀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种关系，操纵中国的政局，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格局中，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演变成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各派各地方的军阀也总是企图获得外国的支持，依靠外国援助来打击国内对手。同清王朝统治者一样，他们为了在进行国内斗争时得到列强的支持，垫付的仍然是中国的权益。在国内军阀争权夺利与对外关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家的权益不断被出卖；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出钱出枪出炮、由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连绵不断。政治极度黑暗，民族危机丝毫没有缓解。

如果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民族危机比清王朝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那么除了中国的权益在继续丧失外，更多的是表现在帝国主义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实际达到的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和令人震惊的。这造成了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交叉发展、相互影响。只要中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和帝国主义的势力仍然存在，中国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时，都不能不充分地关注和稳妥地处理对外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继续深化这一事实表明，仅仅推翻一个卖国的政府，根本不足以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的问题。中华民族要获得独立与尊严，中国的外交要走出困境，需要有新的政治力量，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重新构造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

与列强恣意掠夺中国的利权和各派军阀在外国支持下不断火并同时，辛亥革命后一度消沉的民族解放斗争再次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为站在这场运动前沿的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要使中华民族摆脱如此深重的危机，就必须对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的反帝运动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下层的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得到一个大国的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这一变化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和深刻的。“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必须也只能实行“联俄”政策，这在一大批中国精英中成为越来越明确的选择。在中国内部的反帝革命运动兴起与对外关系的变动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下，20年代中期爆发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运动。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运动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却仍然未能摧毁旧中国对外关系所联系的整个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但是这场大革命毕竟有着辛亥革命所不能比拟的持久影响。它以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形式，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社会传播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反帝爱国思想，使“打倒列强”的口号传播到千百万农民心中，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来的革命中动员和组织民众奠定了基础。从历史的纵深处看，这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能否发生质的变化，是有决定意义的。

1927年春，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标志着大革命运动失败。1928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靠窃取人民革命运动的果实，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局面，但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形成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